

◎名家力作

重读《寂静的春天》

□庄文勤

在半个多世纪前,《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很有争议的书。当时,它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也强烈震撼了广大民众。直到20世纪以后,没有人再怀疑它的正确性,人类文明的多方面进展基于此意识而获得,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蕾切尔·卡逊所坚持的思想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着它们,感到迷惑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栗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鹁鸟、鸽子、椋鸟、鹌鹑的合唱,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地。是什么东西使得美国无以数计的城镇的春天之音沉寂下来了呢?这本书试图给予解答。”

《寂静的春天》开篇就虚设一个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容易找到的城镇,对其中的一景一物作细致的描写,以此带领读者进入这本书的主题,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这种环境变化的迫切感。

蕾切尔·卡逊1907年5月生于宾夕法尼亚斯普林代尔,是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1941年,她出版了《海风的下面》,由于当时人们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本书

虽然受到科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好评,但销量却很小。1952年卡逊辞职,专心写作,先后出版《我们周围的海洋》《海洋的边缘》等专著。

20世纪40年代,许多国家对DDT的使用量不断增加,人们也把DDT作为减少或消除虫害的突破性成果。这种由德国人在1874年发明的价格便宜农药非常有效,能够杀灭蚊子、科罗拉多甲虫等多种害虫。1955年卡逊读到有关DDT的最新研究成果后,她确信DDT对整个生态网造成的危害被人们忽视得太久。

卡逊花了四年时间,收集了随意喷洒DDT等杀虫剂和除草剂危害各种生物以及人类的大量证据。1962年,《纽约人》杂志发表了她基于这项研究的首篇文章,这就是《寂静的春天》的前言。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的反响,公众对政府纵容一些农药公司危害生态环境而又愤填膺。而农药公司的第一反应,是企图通过起诉《纽约人》杂志而封住卡逊的口,一场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博弈拉开了序幕。

当《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开始在书店上市后,农药制造商雇用一些失去良知的学者污蔑歪曲卡逊的论断,赞扬杀虫剂的好处。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可她以沉着坚定的姿态、确凿无误的举证、无懈可击的阐述,表达了滥用农药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后果,重申了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迫切要求。

卡逊的书吹响了人类环境保护的第一



号角。为了对卡逊书中所揭示的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NGO。在卡逊引发的环境运动及推出《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罗马俱乐部的共同推动下,1972年6月5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使环境保护上升到政府事务及国际社会合作的层面,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和使命,并有了为纪念这次会议而设定的每年6月5日的世界环境日。

重读《寂静的春天》,我有许多感悟:地球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相互依赖、相互共存。人类唯有更谦卑、更尊重大自然,反省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停止错误的方式,才有可能挽救人类自己,创造一个和谐、文明、生态的生存环境。

◎灯下品读

剥开荒谬

——读加缪

□林颀

1942年,加缪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局外人》。小说描绘了默尔索在母亲去世和自己杀人这两个事件中冷漠的“局外人”态度。自从《局外人》问世,人们一直在思考人和他人、和外部世界的“荒谬”关系。梅耶从《局外人》入手挖掘“荒诞的起源”。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篇小说的象征意义有多深远?正常状态 and 病态性的偏离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是否可以将这名凶手看作没有良知和忏悔之心的典型现代人?他是否体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是在多大程度上加以体现的?”这些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它们被悬置了,悬置在梅耶故意留给我们的思维空间里。

面对人生处境的大荒谬,我们能做什么?梅耶进一步揭示,“荒谬”的概念早在《幸福的死亡》《卡里古拉》《误会》等作品中就已显端倪。这是加缪在当时面对生存与命运、自由和毁灭、自我与异己等问题时所引发的一系列思考。加缪的哲学随笔《西西弗神话》就是对这些小说、剧作的理念说明。

存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哲学。“它的根本原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存在主义研究专家托马斯·弗林如此概括,“即我们能与我们的生活保持距离并反思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此意义上,我们总是‘超过’我们自身。但是如同我们是自由的一样,我们也是负有责任的。”梅耶所研究的加缪同样基于上述事实。作为北非移民,才会有《误会》中人物背井离乡、追求财富的强烈渴望;加缪曾经加入地下抵抗组织,《鼠疫》反映了法西斯政权如瘟疫传播,无处不在、无人幸免;目睹战后极权主义的盛行,《反抗者》主张只有积极的反抗才能体现人的尊严。加缪潜入生活的深处,并用他的笔描摹时代图像。

20世纪中期的法国政治氛围浓厚。萨特说过,当时的作家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明白政治倾向的重要性,并且让文学回归“它的本质,即一种选择立场的行为”。加缪出版《局外人》时还不到30岁,萨特撰写了《“局外人”的诠释》大力推荐这名年轻人,加缪与萨特、波伏瓦等人的交往在本书中也有很多描述,可惜友情最终还是分道扬镳。

1957年,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得奖理由:“对人类良知有非常清晰且诚恳的阐明。”加缪选择了他的立场,并且坚守到底,他的所有作品都在力求为他所处的时代建构一种可理解性。梅耶将加缪的作品主题与他的个人经历相互交织,抽丝剥茧,一点点深入分析:加缪如何用他自己的方式阐明人类良知。梅耶履行了自己作为评论家的职责——对作家的成就进行阐释和解读,而读者也能对加缪和他的时代多一点“可理解性”。



◎深度阅读

一个人和一座城

——读《我脑袋里的怪东西》

□李季

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横跨欧洲和亚洲两个大洲的城市,这里的人既有欧洲人浪漫乐观的天性,也有亚洲人勤劳善良的秉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的主人公麦夫鲁特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讲述了钵扎小贩麦夫鲁特的幻想、奋斗、挣扎的一生。在麦夫鲁特还是一个生活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穷山村的少年时,他和大部分孩子一样,对未来充满了种种美好的幻想。12岁时他追随父亲来到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

尔,立刻被那些老城消逝、新城待建的景象所吸引,决定在这里做一番事业。然而,他因为是小贩的儿子,在学校被歧视,学业不成功,服完兵役后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贩卖土耳其的传统发酵饮料——钵扎。

他与这个时代所有在底层挣扎的人一样,渴望致富,渴望踏入上层生活,但是运气似乎永远都不眷顾他,小贩生意只能养家糊口,还有被抢劫、被恶狗追咬的危险。他贩卖过钵扎、酸奶、鹰嘴鸡肉饭,干过停车场管理员、电费收管员、餐厅经理,和人合伙开过钵扎店,因为时局动荡、性格善良,处处失败,最后依然选择继续卖钵扎。

爱情婚姻方面,他在堂兄的婚礼上看了中堂兄的小姨子,却弄错了她和她二姐的名字,所以他花了三年时间给这位仅在婚礼上有过一面之缘的女孩写的情书,实际上都送到了这个女孩二姐的手上,后来和他私奔的只能是她的二姐,而不是她。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他因为本性善良,知道弄错了,却不忍心伤害和他私奔的人,只好将错就错,步入阴差阳错的婚姻。他对人生是认真的,他珍惜自己的家人和妻子,可工作失意、生活窘迫仍不断挤压着他。妻子因为不想要第三个孩子,害怕增加生活负担,而私自堕胎惨死。麦夫鲁特后来续娶了他的初恋,最后却发现,他爱的还是前妻,那个和他的种种人生经历密密交织在一起而无法分开的人。夜复一夜,他一边卖钵扎,思念自己的真

爱,一边在头脑中不停地寻找着另一种生活。他这个地位卑微无法完全融入都市里的钵扎贩子,依然怀抱着少年时的纯真幻想,漫步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

当然,麦夫鲁特身边也有很多抓住了机遇顺流而上的发达者,他的伯父、堂兄弟都通过钻营成了上层人,他学不来他们的圆通、投机,却也不羡慕,只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人生。这里有着宿命的怪圈。麦夫鲁特的父亲和伯父娶的是一对亲姐妹,麦夫鲁特和堂兄娶的也是亲姐妹。麦夫鲁特的妻子和妻妹在婚姻上选择私奔,麦夫鲁特的女儿也是。麦夫鲁特的堂兄弟们离弃了小贩生涯,而麦夫鲁特要终身挑起父亲的钵扎担子,命运中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如家族的印记在暗暗传承。

《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通过一个人写了一座城,在展现众多人物命运的同时,描绘了1969年~2012年间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时局动荡和巨大的发展变化。作者笔触细腻,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在全能视角叙述的同时,不断让不同的人物来自我表述,不仅从正面,也从不同的侧面,全方位讲述了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又惊心动魄的故事。如土耳其传统画“细密画”一样,纤毫毕现地展示了一幅幅伊斯坦布尔的生活画卷。作者笔下的麦夫鲁特不仅是麦夫鲁特,也是这世上苦苦挣扎的卑微众生;作者笔下的伊斯坦布尔不仅是伊斯坦布尔,也是承载着无数梦想和痛苦的急剧发展中的一座座城市。

